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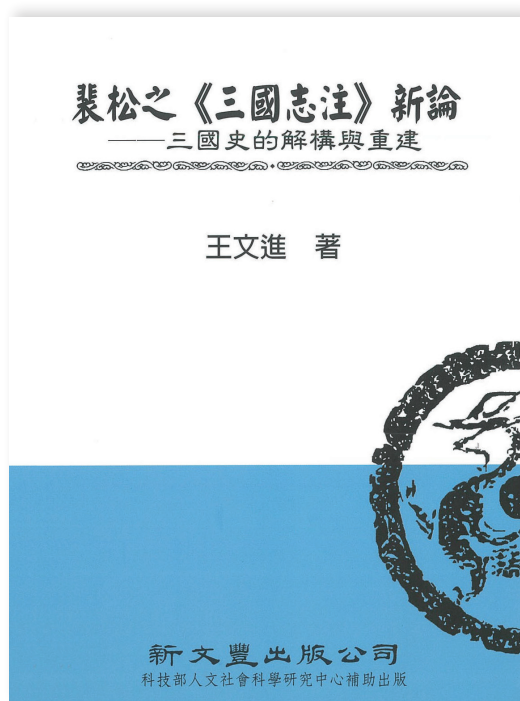
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 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簡介

王文進*

一、導言

就書名看來，本書似乎是屬於「三國史」的著作，但在筆者運筆之際，卻是傾向於「三國學」的底蘊與興味。

表面上「三國史」與「三國學」可以做如是區隔：前者是中國史學中斷代史的一環，其任務在於探究三國時期的歷史真相，於使用的材料方法偏重詳讀陳壽《三國志》、裴松之《三國志注》、范曄《後漢書》，以及袁宏《後漢記》諸書的相互關係。而後者卻是中國文化史的領域，其中最重要的關鍵除了前述諸書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榮譽教授

籍外，更加上環繞著文學經典巨著《三國志通俗演義》承接與擴散的傳統。所以「三國學」比「三國史」更複雜。但是若未有「三國史」的根基，就貿然躍跳「三國學」的舞臺，可能會失之於游談無根。是以本書大致先嚴守「三國史」研究的圭臬，但敘述的筆調和語脈上則適時滿溢「三國學」的企圖與興味。

歷來熱衷於「三國學」的學者，最容易陷入一個簡略二分法的迷思。那就是將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視為「史實」，而將《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小說虛構」。這種危險粗略的二分法，最具體的代表就是清朝咸豐年間清溪居士在〈重刊三國志演義序〉中所說的：

演義之作，濫觴於元人，以供村老談說故事。然悉本陳志裴注，絕不架空杜撰。

於是「陳志裴注」就在如此規範之下等同於「史實」，而《三國志演義》就成了「村老談說故事」。如此二分思維明顯影響了今日「三國學」的主要潮流。其實，莫說是裴松之《三國志注》不一定是「史實」，就是陳壽的《三國志》，若以今日後現代史學觀點詳加推究，也不盡然是不可撼動的「史實」。

西元二八〇年，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了黃巾之禍以來的亂局，表面上歷史的波濤似乎暫歸平靜。隨後十年間，來自蜀國的陳壽完成了《三國志》，可視之為對三國史初度的總結與素描。然而事實上三國的解釋權爭奪戰，方才在魏蜀吳各地史家交相追憶故國家邦人物神采與山河風雲的激情中，悄悄擴展開來。而在一百四十多年後，劉宋元嘉六年（西元四二九），裴松之奉命完成《三國志注》，正好將此錯綜複雜的三國史屬性揭示出來。

裴松之《三國志注》中蒐集的史料總計二二五種書目，史部典籍即有一五七種。歷來對於裴注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大多在外緣的區塊打轉，主要有三個方向：(1) 對裴注成書歷史環境的概述。包括裴松之如何在宋文帝的要求下完成此書。(2) 裴松之注書體的觀察。最重要的在於闡述裴注如何「補缺、備異、懲妄、辯論」這四大骨架。(3) 裴注字數與引書篇目的探究與爭辯。有關裴注的篇幅自從宋代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云比《三國志》本文「多過數倍」以來，學者多沿其誤。近代自余志挺以來陸續有學者重新統計，得出《三國志》約三十六萬餘字，而裴注約為三十二萬餘字的新結論。其他引用書目的統計及諸書原目的考訂亦有不少新說。

這些外緣的成果，均有助於裴注的基礎研究，但真正「探驪得珠」將裴注置諸三國學的大架構中，逐步推究所引諸書在歷史語脈中暗藏密碼的工作，似乎尚未展開。本書的主要意旨就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礎上，將裴注的研究再行推進

一步。首先本書將裴注所引史書劃分為兩大類，劃分的時間指標以陳壽《三國志》成書的年代為分水嶺。一類為《三國志》之前寫就，但為陳壽所刪減者，另一類係為《三國志》成書之後才出現者。前者諸書重要的有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韋昭《吳書》、胡沖《吳曆》。這些書在南宋葉適的眼中，雖然已看出「皆壽書之棄餘也」，但陳壽是基於怎樣立場何種史觀將其棄置，才是探究史家消息的奧妙處。後者諸書重要的有虞溥《江表傳》、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魏晉春秋》、《襄陽記》、張勃《吳錄》。這些書既然是在《三國志》之後問世，在史學的意義上當然可以視為對陳壽的挑戰與質疑。將這兩類史書和陳壽本文詳加對讀分析，在史學的意義上幾乎就可以視之為「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本書除了對孫盛《魏氏春秋》尚未及著墨之外，其他諸書均試圖在三國學的大架構下，分別探尋其史學意義的位置。

二、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締造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本傳〉中雖然用了極隆重的筆觸推崇諸葛亮一生功績，但在史評中卻用「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作收。習鑿齒顯然對此結論有所不滿。最直接的反駁就是巧妙地強調了「七擒孟獲」的傳奇。此一系列的故事在說部《三國志通俗演義》裡，羅貫中用了八十七回至九十回整整四回目的篇幅加以鋪述。檢視《三國志》全文絕無「七擒七縱」的事蹟，習鑿齒加進這些「神乎其技」的傳奇，意在圖繪諸葛亮用兵如神的自信與風采。就算諸葛亮「六出祁山」並不順暢，習氏仍然要創造出「死諸葛走生仲達」的情節來彌補孔明秋風五丈原的憾恨。習氏在三國學最具特色尚不在此一、二事件的增色塗飾，其最舉足輕重的仍在於獨標仁義王道之師，力舉蜀漢正統大纛。

陳壽以蜀漢舊臣身分入北，雖時有遙念故國之情，但由於身處司馬晉王室，故仍不得不以曹魏為紀統。習氏則不然，蓋其已身處南遷東晉，故可奮其意志直指蜀漢為正統。此說由南宋朱熹承其緒，故有說部《三國志通俗演義》純以劉關張及諸葛亮為重心的鋪演。若從三國學的角度而言，習氏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是以習氏二書在諸家中雖成書最晚，但卻為本書列為開篇首章。

三、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

將魚豢《魏略》擺在第二篇的原因，在於《魏略》對於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的各項功蹟顯然和習鑿齒站在完全的對立面。魚豢對諸葛亮與劉備君臣之

間「三顧茅廬」的傳奇最為「骨鯁在喉」。為了銷毀諸葛亮與劉備此一君臣相遇的千古佳話，魚豢遂杜撰了另一則「亮乃北行見備」的故事。雖然此一故事也巧妙地呈現諸葛亮為劉備擴充軍備口糧的籌計，但追根究柢此一敘事策略乃企圖在抽樑換柱的過程中，將諸葛亮的上將良相之才貶低為次一位階的精明官吏而已。甚乃全文歸結處總是環繞著「亮乃北行見備」六字，一旦此關鍵語成立，則「三顧茅廬」的佳話自然瓦解。除此之外，魚豢又激切地描繪「郝昭守城」的英勇事蹟，意在壓抑孔明北伐中原的氣勢。魚豢之言也許會讓習慣於以蜀漢為正統者不悅，但此一立場正可證明魏蜀吳史家各自為其家邦故國爭取歷史解釋的本質。

四、論王沈《魏書》與陳壽《三國志》的史觀差異

在魏晉諸多史書中，王沈《魏書》應該是評價甚低的一本。《晉書》卷三十九傳云：「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另據習鑿齒《魏晉春秋》云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欲討伐司馬昭。「沈、業奔走告文王」，遂有高貴鄉公死於成濟刃下之慘事。王沈為人鄙陋，亦難見容於青史。

裴松之《三國志注》中所引見的《魏書》，最刺眼的就是有關曹操顯赫先世的記載：「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裴注此文當係針對陳壽「武帝記」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來。其次在〈文帝紀〉有一段也是對曹氏政權的阿諛之言：「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若順著前文中葉適所謂的裴注所引「皆為壽之棄餘」，王沈這兩段有關曹操出身與曹丕出生異象的記載，事實上是陳壽所刪除的文獻。如果再進一步追問：陳壽是在什麼立場上刪除這些有利於曹氏王朝的文獻？其中就有極耐人尋味的奧義。因為陳壽在敘述蜀漢先主劉備時，則有「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曾指責陳壽云：「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但是若將前述幾段文字詳加對讀比照，則據裴注以證陳壽本意的方法，似乎極為可行。

五、《江表傳》——「後陳壽時期」的東吳代言人

《江表傳》是最典型的「後陳壽」時期「東吳」的代言人。裴松之一共引用一二三條，出在〈三國志·吳書〉中就占了十分之九。作者虞溥係西晉時期鄱陽內史，但在其子虞勃過江後方上呈晉元帝，故嚴謹地說是成書於東晉。

自從《三國志通俗演義》普及之後，歷來熱衷三國事蹟者的視角大都聚焦蜀漢與曹魏之爭戰，但蜀漢亡於公元二六三年，曹魏被篡於公元二六五年，反倒是東吳國祚延續到公元二八〇年。東吳人物魯肅、周瑜、陸抗諸賢皆風采實亦不亞於孔明、蔣婉、姜維。若非孫權晚年昏聩、立嗣不慎，恐非司馬氏可輕易攻克。而《江表傳》正記錄了後東吳時期，江南人士對其故國江山人物的遙想與詠頌。

首先是對孫氏父子江東創業的頌揚。觀其論孫堅興兵討伐董卓之役，不但極力書寫其討賊之神勇，兼強調孫氏攻奪洛陽「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將其塑造成一忠勇肝膽為國之士。令裴松之亦不禁嘆曰：「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

其次再度不斷暗示孫氏「應運東南」天命的敘事。「應運東南」之說原始自於秦始皇時期的預言，流傳至三國時期，則成為東吳爭取正統的意象。〈三國志·魯肅傳〉曾有「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之語。韋昭《吳書》也有「朝廷承漢之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的說法，但《江表傳》在這方面，則有更強烈的宣示。

《江表傳》第三項色彩最鮮明的則是在有關「借荊州」事件的巧言安排。「借荊州」「還荊州」「搶荊州」是熟悉三國掌故者，琅琅上口的橋段。根據《三國志·蜀書》方面記載，劉備並不輕易使用「借」「還」二字回應「荊州」之事，就算在得了益州後，迫逼於孫權的形勢下，也只肯說：「需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劉備既然用「相與」而不用「歸還」，顯然蜀漢方面避免承認有「借荊州」一事。但《江表傳》不但用「復從權借荊州數郡」意圖混淆劉備僅借「南郡」一郡的事實，還進一步從孫劉赤壁聯手抗曹時期的駐紮地下手，意圖使劉備無從辯解。在《三國志》中，無論是〈武帝記〉、〈劉表傳〉、〈諸葛亮傳〉、〈吳主傳〉或是〈周瑜傳〉等，均云劉備當時駐紮之地在「夏口」，唯獨《江表傳》則云「備從魯肅計，進駐潁縣之樊口」；要知道「夏口」尚屬劉琦的屬地，而「樊口」則為東吳的疆域。若是孫劉聯盟時，劉備駐紮於「樊口」，那就是「寄人籬下」，赤壁之戰的功勞當然全屬孫權。再進一步推演，「荊州」的所有權將歸諸東吳。如此一來，就坐實了劉備「借荊州」的口實，所以《江表傳》將「夏口」悄悄移至「樊

口」，實乃荊州之爭的「強化版」。《江表傳》如何在後東吳時期爭奪歷史解釋權的奧妙，也就不言而喻了。

六、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

所謂「三吳之書」係謂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吳書》、《吳曆》成書於陳壽完成《三國志》之前，顯然今日裴注所引之文正是昔日為陳壽所棄者，《吳錄》則為《三國志》後方出現之書，本質上有對陳壽的挑戰與質疑。

韋昭寫就之《吳書》為東吳官修之史書，當然會有適度推崇孫氏政權的色彩。例如對創業主孫權就有彰顯其帝王氣象的描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蔓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果不其然，如此神話孫氏的辭采，亦為陳壽所刪。細究此一資料存佚原委，既可一則觀韋昭之用心，一則體現陳壽運史之筆的方寸。

胡沖《吳曆》在「三國學」中留下最神采飛揚的名句就是「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句乃渲染建安十八年曹操進軍東吳「濡須口」之役而來。遍尋《三國志》，無論是〈武帝紀〉或〈吳主傳〉，雖均載有濡須口一役，然絕未有如此稱讚孫權的飛揚之句，顯然是在建安十八年後約七十年才經由胡沖藉曹操之口出此浩歎孫權軍容壯盛之言。

通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傳播，此語幾乎成為雅俗共賞的千古名句。更耐人尋味的是南宋辛稼軒也引入其詞作：「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詳究胡沖《吳曆》尚有一事關涉劉備「白帝城託孤」君臣相知版權先後歸屬的問題。「三顧茅廬」「白帝城託孤」係諸葛亮神話的兩大架構。「三顧茅廬」的爭執已詳前文魚豢《魏略》的討論，但「白帝城託孤」一事也不單純。因為《吳曆》記載孫策臨終時曾有如此一筆：「(孫)策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若此事屬實，則早於劉備託孤之舉二十三年。如何將此文獻置諸於三國學的歷史語脈之中，則為本書用心之一端。

張勃《吳錄》成書在《三國志》之後，其用意旨在補述《三國志》之不足，其筆意係對江東政權有不同的「雙重」視角。既勇敢揭露孫策殺戮賢士的內幕，又慨然暴露孫權荒唐亂政的過程。張勃係吳姓朱張顧陸四大家族之後，其對孫氏父子及淮泗集團並不盡然臣服。吳亡傷痛之餘，重新審視江東政權的本質與衰頹原委本末，應有其士家大姓對自身榮耀的自負。是以《吳錄》雖然對於孫氏政權嚴於刀斧之筆。但對於吳中先賢則滿溢頌揚之情。

統觀「三吳之書」的大規格，仍然不脫魏蜀吳三家各自盛讚家邦故事之美的本色。

七、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

筆者既然是一位中文系的學術工作者，一旦碰到「赤壁」的議題時，必然無法迴避東坡飄忽怡然的扁舟之遊，以及《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群英的風采。舉凡略知中國典籍者，當「赤壁」二字迎面而來時，其腦海中被喚起的意象絕非僅止於《三國志》中的烽火戰場，而是交織著「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多重疊影。

決定三國鼎立局勢的赤壁之戰發生於公元二〇八年。令人困惑的是，距離這場「國事」之爭的陳壽理應掌握完整的第一手資料，並且詳盡敘述戰役原始本末。但是《三國志》卻對此役含糊其辭，令三國各自表述。幸而一百四十多年後，裴松之再度徵引諸書方得以盡量加以補記。其中《江表傳》雖然對此役能鉅細靡遺詳加描繪，但終究難免過度偏袒自家東吳將帥功勳，是以本章認為自《三國志》至《三國志注》對於赤壁戰役畢竟還是停留在「國事」的各自宣揚。

然而隨著歷史時間的推移，世人對「國事」的激情終將逐漸沉澱為「史事」的冷靜與客觀。此一轉折當以北宋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為重鎮。該書使得「赤壁之戰」首度有次序地在單一文獻中被完整地呈現。但在同一時期北宋文豪蘇東坡更以〈赤壁賦〉及〈念奴嬌·赤壁懷古〉寄託其宦海浮沉飄然遠逝的「心事」，使得「赤壁」一詞由烽煙瀰漫的戰爭意象頓然轉為雅士清遠的歸隱意象。

毛宗崗在康熙年間的增訂本，引用了明代楊慎〈臨江仙〉的「滾滾長江東逝水」一詞，遂又將「赤壁」轉成群雄爭霸精采絕倫的故事，是以有所謂的「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時間綿延長達一千四百多年。

八、結語

本書是因為獲得科技部（前國科會）多年期計畫方得以順利完成（NSC97-2410-H-259-034-MY3）（NSC100-2410-H-259-050-MY3）。計畫執行過程期間，由於先前已長期浸潤於陳壽《三國志》和裴注《三國志注》的文本，故對於兩者之間歷史語脈和相互牽動的關係尚能適度掌握。最大的挑戰在於筆者想進一步

將《三國志通俗演義》融入全書章節之間。換言之，筆者有意將本書由「三國史」擴展至「三國學」的範疇。唯有如此方不負身為中文系學術工作者的本分。為了達成這個願望，筆者在這六、七年間應邀至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各大學系所乃至民間講壇講演《三國志通俗演義》。由於撰寫講稿的激盪，終於使本書能將《三國志》、《三國志注》、《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大區塊串成一氣。

計畫順利完成應感謝許聖和、林盈翔、陳俊偉、張日郡、胡君輝、鄭有志六位助理的協助。科技部的補助，更是本書推動的最大助力，謹此誌謝。